

2025年2月16日
星期日
乙巳年正月十九
第10450期
总第10964期

今日4版

- 中共贵港市委主管主办
- 贵港日报社出版
-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45-0013
- 新闻热线电话:0775-4523735 13807858011

贵港日报

GUIGANG RIBAO ZHOURI TEKAN

周日特刊



贵港宣传微信



贵港新闻网



贵港日报抖音

重读南山

长弓

1月3日,广西宗教活动场所文物古籍保护信息化工作在我市南山寺启动,文物古籍保护工作者开始对南山寺现存的古代碑刻、铁钟等文物进行信息化抢救保护。

南山为南山二十四峰的统称。南山二十四峰伫立于港南区,离郁江不远,南山寺在二十四峰之一的狮山下依山掘洞而建。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黄海云认为,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,宗教人士为了找到合适的修行场所,不畏艰险,踏进前人所未曾注意到的荒凉之地,并在山林里兴建寺庙,在石壁上雕刻佛像、刻字记事,以此宣扬佛教,同时也成为记录地方历史的重要史料。而南山,由于保存有不少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碑刻、文物,它的重要性愈发凸显,值得我们重新解读。

南山背后的广西历史

包括宗教在内,文化的发展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紧密联系。佛教向广西的发展之路,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推进的,同时也与秦汉时期岭南纳入中央版图后,各民族加速融合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密切相关。一部南山史,不仅是南山的佛教发展史,也是一部微缩的地方史。

公元前214年,秦始皇派史禄修建灵渠、打通粮道,最终统一岭南,设立岭南三郡——南海郡、桂林郡、象郡。其中桂林郡辖今广西大部,郡治布山县,布山县治就在我市中心城区。

秦统一岭南后,广西各民族开始了大融合的进程。为巩固在岭南的统治,秦始皇把原征战岭南的五十万大军(除病死和阵亡者外)留在岭南“适戎以备之”。同时,征调一万五千多名未婚妇女到岭南“以为土卒衣补”,使驻守士兵得以安居。另外,又陆续不断从中原地区迁徙汉人与越人杂处,从此开创了岭南越人与中原人相互杂居的局面,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融。公元前204年,赵佗趁秦末大乱,击并桂林郡、南海郡和象郡,建立南越国,实行“和辑百越”的民族政策。该政策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,因而巩固了政权,安定了社会秩序,增进了岭南各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,加快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步伐,增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。

公元前111年,汉武帝平定南越,再次统一岭南。统一后依然采用“和辑百越”的做法,实行“以其故俗治”的民族政策。自此至东汉末年,岭南地区基本上处于较为安定的时期。

历史学者周仁琴认为,从秦汉至隋唐,虽有各族人民不断迁入广西,但由于广西地处偏僻、交通不便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,气候又炎热潮湿,所以直至隋唐时迁入广西的中原人并不多。到了宋代,特别是南宋时期,北方战乱频繁,中原人民不断南迁,北方迁入广西的人数逐渐增多。许多文人名士或被贬谪来广西做官,或是贬谪途中经过广西,这些迁移活动不仅为广西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,而且使大量中原人口迁来广西定居,促进了广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。中原人民还带来中原佛教文化,与佛教海路南传通道的佛教活动对接,为广西地区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,也为佛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。

早在汉代时,佛教就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合浦传入广西地区。佛教汉代时传入广西,这在贵港出土的众多文物中也能找到端倪。贵县高中14号墓、铁路新村东汉墓等多座汉墓出土胡人形象的陶僧俑,这些僧人头上顶钵(钵为僧人盛斋饭的专用器具,僧人外出化缘通常托钵或顶钵出行),半裸跪坐,双手置于腹前。历史学家认为,这些很可能就是随海船而来的僧人。贵港出土三国时期吴黄龙元年(公元229年)铭文的神兽纹铜镜,镜背的主纹有高浮雕的佛像。贵港还出土诸多莲花纹瓦当、莲瓣纹陶瓷器。莲花纹与佛教联系紧密,莲花为佛教圣花,不仅是艺术形象,还承载了佛教教义。

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认为,古时广西地处边陲,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,经济文化比较落后。虽然在汉末三国时期沿着交通线就有佛事活动,但就整个广西来说,佛事是不发达的。佛事活动只沿着大江大河,在交通便利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展。布山自秦代设县以后,一直作为桂林郡、郁林郡的郡治,前后达800余年,至隋大业二年(公元602年)置郁林县,布山并入郁林县时才被裁撤。在长达800余年的时间里,布山一直作为广西大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。佛教自汉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和西江传播时,作为秦汉、三国及魏晋时期的广西政治文化中心,位于郁江边的布山是较早出现佛事活动的。

周仁琴认为,宋代历任统治者为稳定政治统治,对佛教多采取崇信态度。宋代皇帝对佛寺发展态度主要体现在对佛寺的赐额、赏赐以及对僧人的敕封上。获得赐额的佛寺代表着已获得朝廷的批准,取得合法地位。据学者研究,宋代共发生过6次大规模赐额,分别在宋太祖、宋太宗、宋真宗、宋仁宗、宋英宗和宋徽宗时期。这种赐额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佛寺和僧尼数量的过快增长,使佛教得到理性发展,但又从侧面肯定了佛寺的合法地位,对已获得赐额的佛寺来说,这是一个发展的好机遇。宋代广西佛寺获得赐额的数量并不多,主要有:灌阳慧明寺、宋祥符年间赐额;灌阳大觉寺,北宋熙宁中赐额;贵港南山寺,宋仁宗赐额“景祐禅寺”。从获得赐额的时间可以看出,这些佛寺均是在北宋获得合法地位。如果说赐额使佛寺获得了合法地位、奠定了基础,那么皇帝的赏赐和敕封就是佛寺发展的最大助力。最为典型的就是贵港南山寺和全州湘山寺。南山寺早在北宋时就已获得赐额,有了合法地位,其在咸平初又获得真宗赏赐御书224轴。这种政治上的礼遇使南山寺声名鹊起,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成为其发展的良好助力,南山寺自然发展成为广西著名佛寺之一。



文物古籍保护工作者在对南山寺碑刻进行拓印。陈伟郁摄

南山:宋元明文物宝库

除了古墓葬及出土文物,目前我市现存宋元明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(包括古建筑、石窟寺、石刻、壁画等)不算多。南山寺就是宋元明时期不可移动文物较为集中的地方,寺内历史文物主要有摩崖造像、历代石刻、飞来钟、舍利塔等。1963年,南山寺(石刻及宋代飞来钟等)被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南山寺的历史,传说中最早的建寺时间是汉代,文献中记载的建寺时间最早是唐武则天当政时期。道光《浔州府志》,光绪《贵县志》均载:“景佑寺即南山寺,在南江,离城十里,唐武后赐经五千卷,建楼贮之。”但有考古资料可证的建寺历史是从北宋开始的。原藏于南山寺的《南山题名记》碑(原碑已损毁,自治区博物馆藏有碑文拓片)于南宋宋宗庆元六年(公元1200年)立,最初记载了从宋太宗端拱二年(公元989年)第一代住持善智创建南山寺,到第十四代住持有达,前后住持的岁月、法号。第十五代至第二十三代住持,则由其后各代住持先后刻上。其中第二十三代住持于宋理宗宝祐元年(公元1253年)入院住持。这块碑记载时间长达265年,是记录南山寺建寺历史的重要史料。

和《南山题名记》碑同为南山重宝的,还有宋代铁钟,名为飞来钟,于北宋天圣三年(公元1025年)由江西抚州匠人曾守敬承造。飞来钟重千余斤,上有铭文。清光绪癸巳年(1893年)秋,邑绅陈芝浩(贵县城厢人,清末辛卯科举人,曾任浙江宁波知县,光绪《贵县志》编纂者之一)在其《重游南山寺记》载:“间问丹峰,知故老相传南山开山与神钟飞来为同时,余顿悟,欲考寺先考钟。读是之为皇宋天圣三年己丑岁正月,匠人曾守敬铸金,确信钟为宋物矣。后于洞中大殿壁下得开山题名碑,其第一代开山住持僧名善智,下注端拱二年初开山,合诸钟文则寺为宋时始建无疑。”

南山寺另有一个铁钟为明万历十二年(公元1584年)铸造,由曾任贵县知县、时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的广东东莞人谭耀赠送于南山寺,亦重达千余斤。

宋代倡导文教,由北方来的贬谪士人成为广西文教的重要团体。他们游山玩水,抒发情怀,遗留下数量颇丰的摩崖石刻,因而宋代是广西石刻史上的高峰期之一。宋代两名宰相章惇、李纲(亦为抗金名将)都曾在贬谪途中游览过南山寺,李纲还留下了《次贵州》诗。据不完全统计,南山寺的摩崖碑刻有180多幅(通),其中北宋至明代的就有40余通。由于历史原因,部分碑刻已损毁,自治区博物馆有拓片50幅,其中就包括《南山题名记》碑拓片。

现存的南山碑刻中,北宋陈待制(宋代待制为文学侍从职称,其设置沿袭汉唐旧制,在宋代独特官体系发展中形成新特征。真宗朝始建奉藏御集诸阁,并设立诸阁待制职称。待制为侍从近臣,选任严格、职事清要;又为内朝官,身份归属区别于外朝庶僚。由于年代久远,陈待制名字已漫漶不清)于宋仁宗庆历元年(公元1041年)作的《南山一首》为年代最久远者。南宋陈谠(福建莆田人,南宋庆元年间任贵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)的“南山”题额、《南山诗》和元代燕帖木儿(时任贵州知州兼劝农使)于元成宗大德四年(公元1300年)立的《重修南山寺记》碑则最具代表性。“南山”题额字径约1米,为南山寺石刻字体最大者。《南山诗》于宋宁宗庆元三年(公元1197年)题,为南山石刻中幅面最大者。

除了碑刻,南山寺石佛洞内还有宋代佛像。其中最大的一尊在一块巨大的钟乳石上雕刻,高约3米。民国《贵县志》载:“弥勒佛立像在南山寺大殿石壁间,县治佛像当以此为最古。”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二级教授廖国一认为,其造像风格与桂林叠彩山的宋代造像比



文物古籍保护工作者在对南山寺明代铁钟上的文字进行拓印。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



南山寺的宋代铁钟——飞来钟。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



桂林郡治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。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



桂林郡治遗址出土的莲瓣纹瓷片。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



东汉陶僧俑(1955年贵县高中14号墓出土)。(自治区博物馆资料库提供)